

热带情

香港意

中国心

——王—桃评传

王—桃
詩與詩論
戴望舒題



當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我心中的詩

王—桃題



王—桃
詩歌藝術
(1990)



天威（出版）公司

王—桃熱帶詩鈔

呂劍鐸



徐嘯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玉溪师专学术研究丛书

热带情·香港意·中国心

——王一桃评传

徐啸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 峨

封面设计:丁 亚

责任校对:李 蕊

热带情·香港意·中国心
——王一桃 评传

徐啸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省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 字数:185千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1025-711-0/I·58 定价:12.00元

序

杨振昆

《王一桃评传》的出版是我十分高兴的事，也是我为之奔走的事。说到高兴，一则因为王一桃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香港诗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丰富的创作成果，早该有评传问世了。二则因为完成评传的是我的好友徐啸虎教授，他在不长的时间，默默耕耘，终于拿出了18万字的评传。同是好友，完成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但当啸虎兄要我为之作序，一桃兄也称我是最佳人选时，我却未免迟疑了，久久不敢动手。作序者，往往是身份高，影响大之人，尽管不着边际，隔鞋搔痒，说上几句可有可无的话，但作序者的名字本身就有含金量，就有宣传效应。而一桃兄是我崇敬的诗人，啸虎兄是我大学的学长。要我作序，总感惶惶然，不敢唐突从事。

但深而想之，他们要我作序，确乎也有些道理。毕竟，他们俩的认识，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1994年，我主办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囑啸虎兄一定参加，并将我所喜爱的《王一桃诗选》给他，要他撰写论文。11月8日在云南玉溪召开的盛会，没想两人一见如故。一桃兄的诗人风范、华采辞章、人格魅力促使啸虎兄下决心写作评传。当评传长卷交我看时，我深深为啸虎兄所付出的努力，所写下的扎实的论著

而感动。人生苦短，我常常佩服那些把毕生精力用于研究某一家的学者。若不是在别人的土地上钻探，或许自己已经拥有高楼。但转而又想，若不是名家的魅力征服了学者，学者又怎么会孜孜以求地研究。啸虎兄的评传正是深爱一桃的人和诗所致。

一桃和啸虎两人性格反差极大，一桃性格外向，热情奔放，能言善辩，潇洒风流；啸虎则性格内向，冷静超然，沉默寡言，朴拙木讷。但我深知在啸虎兄似乎冷漠的外表后面有一颗年轻的诗心。诗不是随便能与人谈的，故寡言已注定和诗人有缘。正是两颗诗心的沟通撞击，才有了这本闪射着思想火花的评传。

追溯历史因缘，我确乎作了些“桥”的工作，因此，我作序，无非说些“桥”的话。大陆和香港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大陆学者研究香港的学术成果也日渐增多。但就香港文学的研究而言，宏观的、一般的研究较多，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较少。我常常想，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作家作品，没有过硬的基础研究，就难以真切的宏观把握。而基础研究不仅要有相当的时间投入，而且要花极大的功夫。但由于种种原因，对香港文学扎实的基础研究成果尚少。啸虎兄的《王一桃评传》尽管不是第一本，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示范。它显示着对香港的作家，应该进行有规模的研究。事实上，许多前辈的大家、与王一桃同辈的著名作家，甚至更年轻的颇具实力的作家，都早该有与他们的成就相称的研究成果。或许这本评传的问世会促进对香港文学的基础研究。

这本评传对王一桃的研究是全面而深入的，不仅对诗人的创作道路多有论述，而且对诗人作品的内容和创作艺术有

切当细致的分析。读这本评传不仅能对诗人诗作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而且能通过对一个诗人的透视看到香港文学的特殊性。著者把握住了这一点,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上,在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交汇上,在中国文学传统艺术手法与西方现代创作方法的交汇上,找到了诗人王一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座标。

这种寻找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乃至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有价值的。大陆经历过太久的封闭岁月,因此当开放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常常良莠不分,食洋不化地进行吸收。强调传统的时候,甚至小脚、太监都成了国宝,强调创新的时候,甚至连皇帝的新衣之类的骗局都不敢揭穿。而香港这块土地不管大陆政治风云怎样变化,它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平和而坚定地吸收中西方的文化精华,营造自己的文明。从这一点出发,香港的文学就有了它特殊的价值。剖析香港文学,就可以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站在传统文化与商品文化的交汇点上,冷静、客观地反省传统和西方,反省历史和现代,从而探讨现代化的中国文学将会有和应该有什么样的走向。《王一桃评传》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超出特定作家作品研究的价值。

我熟悉王一桃,因此读啸虎的评传倍感亲切。王一桃本身就是诗,他多愁善感的诗心,他热情奔放的性格,他仗义直爽的为人,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他本名黄寿延,生长在马来西亚,就学于中国大陆,定居于香港。他把《王一桃诗选》自序的标题定为“热带情·香港意·中国心”,便说明了他生活的每一历程,乃至挫折苦难,都化成了他澎湃的诗情。他笔名用“王一桃”,自己戏称为“王母娘娘蟠桃盛会所余之一仙桃”。然而和他接触感到,他并无超凡脱俗的仙风道骨,却有着关注现实的

强烈责任感。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做一个诗人，需要的不是表露衷肠的琐碎的愿望，不是闲散的想象加梦幻，不是刻板的感情，不是无病呻吟的忧伤，需要的却是对于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同情。”王一桃正是这样一位对现实问题有“强烈的同情”的诗人。我听过他朗诵为“九七”香港回归写的长诗《香港，火凤凰》，那深沉的男中音，那含着泪花的眼睛，我久久地难以忘怀。他的激情常常可以燃烧周围的人。有他在场，就有欢乐，就有笑声。在昆明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会上，他和潘亚瞰教授成功地主持了“蟠桃诗会”，由于他们的情的感染，每餐饭都成了诗歌舞兼有的自娱会，长长的旅途，也没有丝毫的寂寞，车箱充满了歌声、笑语。他为人的豪爽仗义，我也深有所感。我在香港讲学的时候，他请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先生出面，并邀约了张诗剑、陈盼耕、林子等宴请我于敦煌酒楼，而且尽力为我排忧解难。我常常想评论家的文笔可以剖析那么多真诗，却很难再现一个真人。

在“九七”香港即将回归之际，透过这本评传，读者还可了解香港，了解香港文学，了解香港人爱国的情和赤子之心。

我衷心地祝贺这本评传出版，但愿它能引起大陆和香港文学界的关注，促进双方更多的学术交流，这或许是我作为“桥”的真挚愿望。

目 录

序 言..... 杨振昆(1)

引 言 “华侨诗人”——“香港诗人”——中国诗人..... (1)

上 篇 王一桃的诗歌道路

第一章 热带风雨未了情 (11)

——《赤道线上的歌唱》和《热带诗钞》

第二章 华夏悲欢赤子心 (47)

——《我心中的诗》

第三章 香江热浪千般意 (80)

——《香港诗辑》

第四章 诗歌天地一沙鸥..... (110)

——《王一桃诗歌艺术》和《王一桃诗与诗论》

第五章 艺术殿堂留永恒..... (132)

——《诗的纪念册》

下 篇 王一桃的诗歌艺术

第六章 树帜顶风走大道..... (156)

第七章	溯本根源飞浪花.....	(176)
第八章	示真导善赋诗美.....	(195)
第九章	穿珠缀玉织华章.....	(216)
第十章	承先鉴外创新格.....	(238)
附 录	王一桃著作简目	(260)
后 记		(261)

引 言

“华侨诗人”——“香港诗人”——中国诗人

明丽的朝阳从抚仙湖对岸的群山峡谷中升起，云南澄江县著名风景区禄充旁的笔架山庄，被金色的旭辉晕染得壮丽璀璨，辉煌夺目，抚仙湖碧波澄净，是一个晴美的冬初的早晨。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我绝早便乘车赶到山庄，恭候从昆明前来赴会的世界华文文学的知名作家。

贵宾们乘车到山庄之后，我结识的第一位诗友，便是神交已久的王一桃先生。通报姓名以后，他惊喜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他惊诧的是，我与他素昧平生，却居然写出了评他的《香港诗辑》的论文《都市生活的艺术画卷》。原来，撮合这段因缘的是我的好友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昆教授，他把王一桃的诗集借给我，又把我的论文稿寄给诗人。于是，未曾相见成诗友，全凭文字结因缘，我们便神交为朋友了。

我也握着王一桃的手，仔细端详他，只见他身着整洁的深色西装，前额宽阔，炯炯闪亮，架着一付宽边褐色眼镜，鼻直口阔，仪态端庄，操一口响亮的略带广味的普通话，举止奔放潇洒，豪放中见真诚，诗人的气质和外交家的从容辞令有机地结合在他身上。一见面就有如逢远方亲友，立即心心相印之感。

在会上，他捧着我的论文，到处分发介绍，使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我从小浸淫于儒家诗教，又受过多年政治磨难，总是告诫自己要进退有仪，谦虚温顺，深隐潜藏，免得那些无端飞来的流言暗箭，莫名其妙地便射在自己的身上。年逾花甲的王一桃君却丝毫没有受到这种影响，他像一团烈火在燃烧，又像一颗星星在闪亮。时而大声疾呼，时而侃侃议论，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朗声长吟，处处表现出诗人的至性真情，表现出他对朋友的坦率与真诚。无论是泛舟夜游抚仙湖，还是在玉溪市月光俱乐部主持“蟠桃盛会”（由潘亚曦和王一桃主持的文艺晚会），他都是最活跃的人物。他一到哪里，哪里就洋溢着欢乐和笑声；他一出现在舞台上，全场的气氛便活跃起来。后来，知道我正在研究他的诗歌，便陆续寄赠诗集给我。于是，经过会后的书来信往，酝酿讨论，这本《热带情·香港意·中国心》便应运而生了。

只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人
故我为万物之灵而泣而歌

只因为我，结缘的是 缪斯
故我一生为情而反复吟哦

（王一桃《我的诗宣言》^{（1）}）

这是王一桃的自白，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迄今为止，他 62 年的生涯可以用“热带情·香港意·中国心”来概括。目前诗人正处于春秋鼎盛，精力旺盛之年，可以断言，他将写出更美妙的华章，获得更卓越的成就。

他原来就是一位“华侨诗人”，本名黄寿延，1934年6月9日出生在马来亚丁加奴，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他三岁就失去父亲，从此家道中落，陷入贫寒境地。他在诗中回忆这段生活说：“我儿时的保姆是腰围沙笼的姑巴刹⁽²⁾，/颤巍巍地，笑看我呀呀学语步步学行。我童年的摇篮是漂浮水母的丁加奴河，/慢悠悠地，摇着我堕入梦乡拥抱人生⁽³⁾。”1941年日本南侵马来西亚，使年幼的黄寿延辍学三年多。后来，他重入当地唯一的华文学校——丁加奴中华维新学校就读，高小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学艺股股长，并任班报《垦荒》、《余甘》主编。这时，他开始接触进步报刊和革命文艺作品，最早读到的是《新儿童》、《中学生》、《马来亚少年报》和《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中兴日报》，还有《南侨日报》的《学生园地》和《文学副刊》，后来还读到《风下》、《文艺生活》、《音乐·戏剧·诗歌》等文艺刊物。接着，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冰心的散文、闻一多和艾青的诗、巴金的小说、鲁迅和其他文学家的作品。于是，一株文学的幼苗，就在五四新文学和当地华文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了。

王一桃这一笔名是怎样起的，以后何以还成了他的通用姓名？陈耀南在《起舞翩翩王一桃》中推测说：“黄寿延兄甚么时候采用笔名王一桃，陈某不知道，只知道粤语黄王同音，国语也是谐韵，而王母仙桃，也同延寿有关，至于是否与当初因爱祖国而‘往’北一‘逃’，那就要问黄兄自己了⁽⁴⁾。”这推测很有道理，中国人的惯例是有名有字，又有别号，名与字含义相同或相近。“王一桃”，王母娘娘之一桃也，吃一颗蟠桃可以“寿与天齐”。延寿佳果，莫过“王一桃”也。

诗人在少年时就勤奋写作，经常给《马来亚少年报》投稿并被刊登，他的习作《丁加奴之夜》被《星洲日报》刊登，同时，

他还在各家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当时他才十三、四岁，算得上是一位“少年颇挺出”的小神童。不过，王一桃律己很严，并不沾沾自喜，反而认为“发表出来的诗文仍然没有一篇称得上是作品”。1948年，王一桃独资创办了一家新南洋书店，专门出售鲁迅、茅盾、巴金以及外国作家高尔基、罗曼·罗兰和萧洛霍夫的小说及著作，这就触犯了英国殖民当局实行的“紧急条例”，以致被无理逮捕入狱。在饱尝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活后，王一桃又被裁定为“文字叛乱的首要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其时他才十八岁。

以后，回忆到这段时期的生活，诗人深有体会地说：“1948到1950这两年间，我接触了不少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我的文学修养全靠自学得来。与此同时，我广交文友笔友，切磋文艺⁽⁵⁾。”对于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生涯和被遣返回国，诗人曾写出交织着深情与愤懑的动人诗章：

撒一颗种籽在东海岸的文化沙漠，
惊喜一片绿芽破土而出枝叶茂盛！
将渴求甘露的信息交热风带往四方，
回报是热烈的雪浪花，冰冷的遣送令……

《关于我的诗》⁽⁶⁾

1952年走进祖国的南大门，王一桃获得了深造的机会，他先后在广州知用中学、第二十二中学、第八中学修完初高中课程，又在1957年考入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并于1961年秋毕业。在中学，他先后被选为语文科代表、学习委员、班主任、学生会文化部长，并一直担任班报、校刊主编，还给中国作协

广州分会主办的《作品》投稿，其中《马来亚狱中诗钞》（七首）就发表在《作品》1957年9月号上。在这几年中，他疯狂地读诗写诗，受到许多良师益友的鼓励，诗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也不断提高。继《马来亚狱中诗钞》后，又发表了《新加坡啊，新加坡》（《作品》1957年12月号）。接着，广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和林林、黄东平、犁青等人合著的诗集《赤道线上的歌唱》，王一桃和上述几位诗人都因此获得“华侨诗人”的称号。

1957年，王一桃中学毕业后曾短期赴香港，《香港诗辑》中的第一组诗《香江去来》就是1957年8月的作品。

1957年9月，王一桃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念大学，他被委任为中文系系刊《百花亭》和《叠彩》的编委，继续进行诗歌创作。然而，政治风云不断变幻，极左思潮日益泛滥，不是缪斯女神不再光顾他的诗歌王国，而是因为海外华侨生活题材受到排斥，他写的诗歌无从发表。《香江去来》被搁置，连受到作家出版社诗歌散文组高度评价的诗集《马来亚诗钞》也被割爱退还，他正在准备写的几部长诗也都胎死腹中。幸喜在1959年，他的《桂林·阳朔抒情》组诗在12月号的《诗刊》上发表，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大跃进”的年代，中国成了诗歌的红海洋，成百万首千篇一律的民歌和“吹牛皮、放大炮”的“卫星”一起腾空飞舞。然而，那些赶潮流说空话的复制品都经不起时代的检验。诗人必须说真话，倾吐人民的心声，弹奏时代的旋律，就要敢于面对现实，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王一桃不愿意说假话，诉假情，发出鹦鹉学舌的空洞呐喊，就只有停止歌唱。他在《我的文学道路》中回忆说：“由于那段期间从未写过一首‘反右诗’或其他配合当时政治运动的诗作，因此在系的政治秘书和年级主任

的心目中，我自然是属于‘思想右倾’‘只专不红’的学生，加上我的海外和港澳关系，注定了我只有被改造的命运。在这种际遇下，我还有甚么心情去写诗？诗神从此离我越来越远了！”⁽⁷⁾。

从1961年到1976年，王一桃一直在大学中文系（科）任教，先是在南宁师专、广西师专教写作课，而后转到广西民族学院任现代文学及写作教研组副组长。他一手写诗，一手写评论，他的《归侨短笛》组诗散见于《侨务报》和各地报刊，叙事长诗《“娘惹”》刊登于1963年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副刊；此外，《漫谈写诗》、《苏东坡写月》的诗论，还刊载于《四川文学》和其他报刊上。1964年他被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吸收为会员，并担任南宁市文联文学组副组长、海燕诗社顾问，还和秦似等人代表广西写作组赴京写稿。

这段时期，他的命运也随着政治运动的兴衰而起伏升降：运动不来，教学骨干，吃碗教书饭；运动一来，重点对象，专吃检讨饭。到了“文革”期间，因为有“海外关系”，被剥夺了写作权，停止了教学和创作，后来落实了政策，也可以提笔写作了，但还是只能违心地写“遵命文学”。他有一篇《不要硬搬和模仿》的文艺随笔，被省报开展内部批判，说是“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

正当诗人处于“四面楚歌”之际，他把自己偷偷写下的文艺随笔寄给茅盾，茅盾虽然目疾加重，难以提笔，仍然热情洋溢地给王一桃回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尊作只看题作，就知道是切中时弊，曾由孙儿读给我听，我不能赞一辞，谨祝工作胜利成功。”在茅盾鼓励下，他后来还创作了《告别昨天》组诗等作品。文学巨匠的关怀勉励，王一桃是永世不会忘怀的。

1976年10月后，王一桃开始转到广西文化局从事文艺研究，继而参加广西文联、作协组织的恢复事宜，最后转到《广西文艺》编辑部担任诗歌组和理论组的编辑。在三年多的时间内，他写了几十篇理论文章，几百首诗歌，发表在各级报刊上。他在省内多次作过《彻底批判‘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让更多的优秀作品和读者见面》的长篇报告。他还到广西各地采风，到北京参加观摩会演，利用这个机会，他走访了不少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此外，他还由萧山县文化局内部出版了《诗歌的创作和教学》这本理论专著。诗歌代表作则有《归侨短笛》和《告别昨天》，充满了被解放的欢欣和昂扬奋发的激情。如1977年发表在《诗刊》上的《春》：

来自云烟渺茫的大海彼岸，
你第一次拥有祖国的春天。
想起那年壮志难酬愤然去国，
正值故乡寒风凛冽，万木凋残……

如今面对枯木逢春，冰河解冻，
怎能不欣喜欲狂，彻夜难眠？
你要把培育多年的科学新花，
双手奉献，将祖国之春装点……⁽⁸⁾

1980年春，王一桃全家来到香港，办理继承遗产手续，并以商养文，用生命的火炬点燃诗歌创作的烈焰。面对着拜金主义狂潮和庸俗文化的泛滥，诗人冲波劈浪，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全家五口合力奋斗，终于

化逆境为顺境，化坎坷为坦途，生活比较宽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一辈子也没有后顾之忧，为诗歌创作的腾飞猛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他又被人称为“香港诗人”。

金钱的作用也是两重性的。当它掌握在魔鬼的手中就成为精神的腐蚀剂，成为制造罪恶的手段；而当它掌握在天使的手中就会化成传播圣灵的福音书，滋育人的灵魂的强壮剂。王一桃把节衣缩食省下的金钱化为一本本好书，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园地，培育出朵朵鲜花。十五年来，他一共出了30多本书，其中有十本诗集，即《赤道线上的歌唱》（合著）、《王一桃香港诗辑》、《我心中的诗》、《王一桃诗歌艺术》、《王一桃热带诗钞》、《王一桃诗与诗论》、《王一桃诗的纪念册》、《香港诗人王一桃选集》、《王一桃诗选》、《香港火凤凰》、还有古远清教授编选的《王一桃诗百首赏析》。纪实文学、散文集则有《五十个文艺家之死》、《和你共勉的话》、《香港作家掠影》、《中国作家印象》、《香港——文学之桥》、《文化名人悲欢录》、《香港 艺术之窗》、《王一桃散文选》共八本；文学理论和评论集（包括创作经验谈）有《诗歌的创作和教学》、《引你入门的书》、《怎样写游记》、《香港文学评析》、《为你示范之作》共五本。此外，从1962年1月到1995年7月，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的单篇诗歌理论和评介文章共有270篇（目录见《诗与诗论》附录），文论则更多。这些论著主要又是在诗人到香港定居后完成的，他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凝结于文字载体之中，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既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又表现出高尚的奉献精神。

王一桃又是一位热诚的社会活动家和文艺创作的组织者与倡导者，他加入了香港作联、香港作协、香港艺盟和香港文